

行动者的空间

甲左村变迁的教育人类学研究

丁月牙 著

行动者的空间

甲左村变迁的教育人类学研究

丁月牙 著

Q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动者的空间：甲左村变迁的教育人类学研究 /
丁月牙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495-8860-2

I. ①行… II. ①丁… III. ①乡村教育—教育史—
研究—贵州 IV. ①G7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785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 62 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13.25 字数：400 千字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的缘起.....	1
二、基于空间的分析框架.....	2
三、行动者视角.....	8
四、本书结构和主要观点.....	13
五、“跨城乡空间”概念建构.....	17
结束语.....	22
第一章 甲左水族村.....	24
一、三都县及甲左村概况.....	24
二、水族文化.....	26
三、水族村寨.....	34
四、水族学校教育发展史.....	40
结束语.....	51
第二章 口述史中的村寨教育.....	52
一、研究概况.....	53

二、甲左小学印象	57
三、甲左小学官方简史	65
四、甲左小学口述史	70
五、学校与村寨变迁	138
结束语	156
 第三章 村寨教师身份认同建构——潘学联生活史	158
一、潘学联生活史	160
二、身份认同的概念	182
三、学校教育对身份认同的形塑	187
四、冲突中的身份认同建构	193
五、弹性的身份认同	205
六、身份认同建构与村寨变迁	229
结束语	260
 第四章 “走出去”与村寨变迁	261
一、研究概况	262
二、“走出去”现象的产生	268
三、教育与“走出去”	274
四、“走出去”的三种类型	283
五、路和“走出去”	294
六、“走出去”与村寨变迁	305
七、“走出去”和“跨城乡空间”的产生	332
结束语	340

第五章 跨城乡空间——村寨变迁研究的新视角	342
一、农村变迁的时空脉络	342
二、现代学校的空间建构意义	352
三、行动者的跨城乡空间建构	367
四、从“跨城乡空间”到“跨城乡共同体”	375
结束语	397
附 录	400
参考文献	404
后 记	413

绪 论

一、研究的缘起

2012年，我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前往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偏远的水族村寨——甲左村进行田野调查^①。早在十年前攻读博士学位时，我曾多次在这个村落做过田野调查。而从表面上看，甲左村似乎依旧停留在旧日的时光里，目所能及的变化不过是出现了几栋有别于吊脚楼的现代楼房。古老的甲左村是被外面喧闹的世界所遗忘，还是在宁静的外表下潜藏着涌动的暗流？在急剧变迁的现代中国，很多类似甲左村这样的村寨，在这场变迁盛宴中有过什么样的遭遇？边缘化族群村落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生存并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了我对村寨的社会变迁这一主题的关注。

社会变迁是无数社会科学研究者着力探讨却又远未穷极的研究内容。特别是，随着近几十年来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化浪潮的兴

① 为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本书中出现的关键地名和人名均为化名。

起，社会变迁的速度日渐加快，变迁的内容和类型日益增多，研究者们也更迫切地想厘清变迁的动因、发生机制以及它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像甲左村这样的民族村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等多种因素导致该村一直处于较为缓慢的社会发展进程之中，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才陆续发生了一系列比较显著的变化。这种浓缩在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现象为研究小社区现代变迁提供了绝好的考察范本，其历史事实在社会成员的记忆中依旧鲜活，能够通过他们的生活史叙事加以生动再现，也可以借助其日常生活进行充满现场感的观察，获得当地人的视角来建构微观社区从传统迈向现代的社会进程的立体图式。

选择甲左村开展社会变迁研究还缘于我在该村已有一定的积累，对它的基本情况比较熟悉，和当地人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均有助于后续研究的顺利开展。在这个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村寨，村民的记忆和个人生命历程是收集研究数据的主要方式，和村寨建立的信任关系也便于我作为一名外来者在访谈中获得本土视角下的真实而详细的一手资料。

二、基于空间的分析框架

在农村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中，最为常见的分析框架是城乡二元论，以阿瑟·刘易斯(W.A.Lewis)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采用的农业依附工业、农村依附城市的分析逻辑为典型，强调了城市在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的主导作用^①。在二元逻辑之下，传统和现代、边缘和中心、城市和乡村自然而然成为对立的两端，其假设通常是：城市化是农村的未来，工业化是农业的未来，现代化是传统的未来，二元对立出现的原因是后者还未完全发展进化为前者。在这些假设前提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问题的很多结论和对策往往是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强调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先天劣势和边缘化。

然而，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城市病和环境污染弊端开始出现，大规模的频繁的跨城乡人口流动和资源交换突破了城市和乡村的隔离，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让传统和现代的边界变得模糊，这些社会现实的新特征促进我们反思二元解释是否依旧适用。我们是立足于社会现实来采用合适的分析框架，还是继续沿用城乡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来分析和解释现实问题。

实际上，在20世纪后半期，二元分析视角引起包括吉登斯、布迪厄在内的很多学者的批判。不少中国学者也对我国的城乡二元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反思。有学者指出社会事实与两分法的“理想社会类型”相差甚远，现代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经济混杂性和多元性以及地区差异性，简单地用“二元经济结构”无法概括^②。社会互构论^③、城乡互动

① 王国敏：《城乡统筹从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

② 张鸿雁：《论当代中国城乡多梯度社会文化类型与社会结构变迁——依据“社会事实”对“二元结构”的重新认知》，《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1期。

③ 杨敏、郑杭生：《社会互构论：全貌概要和精义探微》，《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4期。

发展论^①等研究成果的出现，提出了以双向流动和平等互构代替二元对立和线性因果的城乡关系分析框架。

否认城乡二元对立，并不意味着否认城乡差异这一现实。然而城乡差异和城乡二元对立有着本质的区别，差异强调了不同，但不一定就会导致二元，也不意味着矛盾和冲突的必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性使人与社会的原有关系正在瓦解，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在新的关系的形成过程中进行重新审视^②。只有明确了这一立场，才能在面对农村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方面获得新视野。

近年来，城乡之间在空间关系上发生的变化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把空间作为理解城乡关系的新框架成为一些研究的新尝试。有学者提出将城乡关系统一于“自然”，打造城乡空间共生的生态城市^③，或者从城乡网络空间关系视角指出城乡的联系和交流已经转向了多元化和全方位的空间交流，随着城乡之间网络设施的完备、产业的密切联系以及要素流通的通畅，将出现一个城、镇、乡网络系统共生空间^④。更多的研究则对跨城乡进行空间流动的村民外出务工现象进行了关注。

① 段娟、文余源、鲁奇：《近十五年国内外城乡互动发展研究评述》，《地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4期。

② 郑杭生、杨敏：《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拓展——简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黄光宇：《城乡生态化：走向生态文明的发展之路》，《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④ 曾菊新、冯娟、蔡靖方：《论西部地区的城镇网络化发展》，《地域研究与开发》，2003年第1期；曾菊新：《中国农村发展呼唤：农树空间经济学》，《开发研究》，1994年第4期。

以空间为分析框架来研究城乡关系和农村变迁及未来发展，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理论。

而“空间”概念本身在20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所谓的“转向”也为这一分析框架的形成提供了契机。传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曾处于一种“去空间”化的状态^①。空间被视为静止的容器、恒定的背景，并不构成变迁本身，也未作为独立存在的主体被赋予研究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空间感^②，引起了学界的反思，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学者主张，空间形成于社会，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其形式乃是社会过程的结果^③。社会实践影响并改变了空间结构，又与空间结构相结合，从而形成实践的空间性，空间的物质属性、主观意义和社会作用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相互影响，不可分割^④。这种空间的概念转向将空间从物理的客观实在和主体的感性经验——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抽离出来，成为联结主体和客体，弥合精神与物质，作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的一种

① 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② 大卫·哈维著，阎嘉译：《后现代的状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约翰·厄里：《社会关系、空间与时间》，德雷克·格里高里、约翰·厄里编，谢礼圣、吕增奎译：《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 郑震：《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④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D. Nicholson-Smith, Trans.).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1991.

体现，空间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田野调查发现，甲左村的变迁不是独立的，也不是纯粹自发的，从空间视角观察，它更像是一个生命有机体上的细胞，始终与外部世界保持着紧密联系，与更大空间范围的社会融合共生，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意味着变迁是空间关系上的一个正在发生着的动态过程。村寨变迁既要放在时间纵轴上进行观察，也要放在空间的横轴上来加以分析。特别是2000年之后，随着现代信息通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发达，大大缩短了甲左村和外界的空间距离，村寨向城市大规模地输出口，跨城乡流动的频率和程度不断增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比例基本上占了青壮年人口的90%以上。日渐开放的甲左村和外部世界之间原本明晰而确定的文化和社会空间界限发生了变化，空间挣脱了原来的地理束缚实现了“脱域”^①。因此很难给村民跨城乡的社会活动划出一个想象中的固定的空间边界，空间是流动的，也是变化的，是村民社会实践的建构结果。这种空间特性正符合社会学和人类学对空间转向的描述。

城乡空间关系状态是伴随着城市与农村变迁过程而不断发生变化的，空间理论视角将农村置于一个和城市相对平等、不分主次、各有优势并可以展开对话和交流的地位。不过，以社会关系的束集为表现的，综合了社会文化空间、自然空间和心理空间为一体的农村社会变迁研究，目前还处于空白状态。虽然人类学家较早关注到了空间与空间之间的文化传播现象，以跨文化比较来理解文化变迁，然而研究的

^①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7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对象是文化和族群，空间自身不被作为变迁的主体。此外，在传统的只认可空间的背景角色和单一属性的农村研究中，城乡之间的空间关系被设定为二者在物质距离上是分割的，在社会发展的时间轴线上是先后的，在利益格局上是边缘—中心的，但是，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村民跨城乡的生活方式让这种被城乡二元制度所宰制的空间分隔日益走向共融。^① 村民以自身对跨越城乡的空间实践行为以及相关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产生了新的空间认知，形成了心理和社会维度的空间重构。正如列斐伏尔所强调，不存在没有空间变迁的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未曾产生空间变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变迁是虚空。^② 在他看来，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以空间中的生产方式为特征的世界，空间变革，产生新的空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的改变，都是从合适的空间的生产开始。他基于对日常生活中人类活动的观察和批判性反思所得出的结论，强调了人类发展的真正动力来自充满着异化又满载着希望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改变最终必然成为空间的改变。^③

从空间理论视角解读中国乡土社会，不仅是拓展乡村研究视阈的有益尝试，也是提高理论解释力的必要之举^④，即便是关注小型社区或

① 杨桓：《空间融合：城乡一体化的新视角》，《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

②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D. Nicholson-Smith, Trans.).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1991.

③ 张子凯：《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评述》，《江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④ 刘拥华：《阅读秩序：空间语境下的乡土社会及其变迁》，《人文杂志》，2008年第4期。

者村落研究，也需要认识到所研究的文化单位在空间意义上已经是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①。因此，本研究采用以空间为分析框架来探究甲左村这个微观社会的变迁及其动力机制。

三、行动者视角

学校教育和中国近现代的乡村社会变迁关系密切。晚清以来，乡村命运的改变往往和现代教育制度的推行绑到了一起，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成为不少有识之士寻求改良百年不变乡村的理想。从晏阳初到陶行知、梁漱溟，现代教育承载着独特的社会使命和梦想。至国民政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推行“国民教育立国”，乡村普及现代中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再次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49年之后，新政府对乡村教育的各种运动和改造也未曾有一刻放松。如果抛开这些有意图的政治和社会举措不谈，从本质上看，教育之于乡村的重要意义在于现代学校是传统社会内部现代性生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生产现代性的重要方式，在促进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②。开展现代教育与乡村变迁之互动研究的价值和学术意义还在于，扎根于特定时空情景下的现代学校，所面临的文化和社会互动的复杂局面，最能反映现代性在中国的具体历程，提供有关乡土社会的现代化之反思，

① 王铭铭：《文化变迁与现代性的思考》，《民俗研究》，1998年第1期。

② 王铭铭：《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但鲜有研究对此进行细致而丰富的呈现。^①

在甲左村，唯一的现代学校——甲左小学是村寨的突出地标，富有国家权力和主流文化的象征：小学操场上空飘扬着五星红旗，二层教学楼是村寨第一栋也是唯一一栋较大型的砖混结构现代建筑，校园高音喇叭播放的现代流行音乐不时打破村寨的宁静，立于田间的高墙则将校园围成一个独立的王国。学校更为隐性的社会作用在于提供规范而正式的社会化场所取代村寨传统的言传身教之社会化方式。乡村学校的此类角色，被不同的学者描述为“村落中的‘国家’”^②、“国家权力的代理人”等。但是，无论是国家的象征还是社会的整合，位于传统社区中的乡村学校，和本土社会存在着的互动关系远不止于三言两语的简要描述。这种具有突出的乡土性和复杂性特征的作用机制是研究教育与社会变迁的核心内容。

社会整体论将教育视为社会的子系统之一，立足于系统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讨论教育和社会的关系，使用的是“社会变迁的方面 $\rightleftharpoons$ 教育变迁的方面”或者“社会变迁的类型 $\rightleftharpoons$ 教育变迁的类型”这类一一对应的研究思路^③。教育的社会作用也因之被分解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功能来加以分门别类的阐述。特别是结构功能主义将教育

① 王铭铭：《教育空间的现代性与民间观念——闽台三村初等教育的历史轨迹》，《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② 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吴康宁：《社会变迁对教育变迁的影响：一种社会学介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视为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稳定发展的统一体，所得出的教育和社会之理想关系往往是：教育系统和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相互独立，界限明确，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彼此适应的过程中进行自我调整最终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此类想象性建构的研究景象被吉登斯批判为社会系统理想化的假设，他认为这种想象让社会变迁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一种“无人化的”奇怪倾向，人的行为及其社会实践给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被忽略，这是一种对社会学的典型误读，它将社会系统看成与生物系统类似的东西，认为社会内部存在既定结构用于支配社会的稳定和变迁。^①“无人化”的变迁研究往往集中精力在教育和社会之互动关系的抽象思辨，但它无法等同于实际运行的社会现实。

像甲左村这样的微观社会，学校和村寨之间在现实中的互动远比“无人化”抽象思辨所建构的作用和反作用、矛盾和适应等关系来得复杂。教育和村寨的互动需要依托于学校的各种活动以及活动的施受者——教师和学生的参与来实现。例如，学校在村寨的扎根有赖于本地人对学校的接纳和支持以本地教师对办学的参与；教育对村寨社会关系的重构借助需要受教育者的社会化过程，学校在村寨内部的现代性培育也首先从受教育者的价值培育着手。人，或者说有行动能力的村民，是教育作用于村寨变迁的执行人，也是教育推动村寨变迁的中介者。作为有自由意志和实践能力的个体行动者之社会存在的意义是

① 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第5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一个无法忽略的社会事实。因此，甲左村这种处于“普遍性”和“规律性”之外的充满着地方性知识的社会事实，是社会整体论的变迁机制模型所不足以解释的。费孝通先生将此类村寨描述为充满乡土性、处于现代和传统接触边缘的“很特殊的社会”^①，任何教育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因果关系路径预设以及抽象思辨的想象力都很难如实呈现那些寓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充满了细节和情节变幻的社会事实。

和社会整体论不同，具有人文主义传统、持个体主义立场的研究者们提倡从行动者视角来研究社会，选择被社会整体论忽略的社会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作为研究对象。行动者视角持有这样的假设：社会是通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得以建构的。行动者视角经常聚焦于微观社会，从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细节来观察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情景化、秩序、符号互动、交换、自我建构等。20世纪50年代之后，个体行动者的行为及其意义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

行动者视角批判了社会整体论关于个体对于社会变迁影响甚微的论断，提出社会是由意志自由的个体构成的复杂结构，有自然界所没有的现象和本质；社会的结构和过程、规范和秩序都是个人活动的结果，社会过程可以被还原为个人间的交往行动而得到解释。^②社会虽然对个体有制约作用，但个体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人类个体总是在创造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第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 郑杭生、杨敏：《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拓展——简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